

新世纪文学二十年：如何进入中国的当下和中国的现场

本报记者 傅小平

近期于江苏南京举行的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、第三届扬子江诗会·大家讲坛、第四期上海-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分别聚焦新世纪背景下的小说、诗歌与非虚构文学议题。如果说,近些年非虚构文学就像评论家金理所言,一直在向各种各样的门类开放,反映在当下刊物、媒体上,除了小说、诗歌之外,纪实文学、散文等命名都好像看不到了,都被归为非虚构了,那么这三个议题搁置到一起,已经差不多涵盖了“新世纪文学”这么一个大的概念。而这些谈论虽说异彩纷呈,从主色调看,却无非谈的近三十年,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小说、散文、非虚构文学总体表现如何,留下哪些有益的启示;如今处于何种阶段,存在何种问题;未来面临哪些挑战,又将是怎样一种图景。

小说：“先锋”和“现实主义”的深层互动和融合还将持续吗？

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,设置了“先锋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径”“青年写作中的乡村与都市”“当下文学中的历史与现实”三个议题,分别对应的“先锋与现实主义”“乡村与城市”“历史与现实”三组概念,就像评论家岳雯说的那样,这三组概念看上去是二元对立的关系,但在某种意义上,它们又都是融合的,是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的。

而这样的融合,更可以说是“先锋之后”的融合。作家李洱曾以陈忠实的写作为例提出,先锋小说激活了陈忠实的所有经验,没有先锋小说在前,哪有《白鹿原》在后?显而易见,如评论家方岩所说,在李洱看来,陈忠实正是通过大量借鉴潜意识、非理性、魔幻等现代主义手法,才深刻地展示出人性深处的东西,揭示了人性的悲剧、人生的苦难。“推而言之,我们不能否认,先锋小说背后的美学体系起到了普及文学常识的作用,从而影响了此后的文学创作。”

这种影响是如此深远,以至于如评论家王晴飞所说,现在的现实主义不可能再像先锋之前的现实主义那样写,现在的作家也不可能完全像以前那样去思考和表达。的确如此,如果在具体文学史事件的意义上来讨论“先锋”和“现实主义”,诚如评论家丛治辰所言,某种意义上,先锋文学正是产生于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不满,那时“写什么”的问题已经深深地束缚了文学创造力,于是才出现了“先锋文学”这样一个事件。“但‘先锋’和‘现实主义’这两个概念有一定的矛盾性,只有解放和激活它们,我们才能理解前者对后者的意义。”

丛治辰提及三个层次的概念解放。第一层解放接近于今天一般的理解,即“先锋”并非指的具体的当代文学史事件,而是指该事件所造成的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技术更新;而现实主义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、要求对历史与世界有总体性认识的现实主义,而将那些表现现实题材的作品都称为现实主义。“如果这样理解‘先锋’和‘现实主义’,它们之间已经产生了非常良好的互动。作家徐则臣说过类似的话:今天好的小说应该内在是先锋的,外在是现实主义的。我想这个表达基本可以说明先锋和现实主义的一个理想关系。”

如果继续深入研究,丛治辰认为,似乎还可以对“先锋”的概念内涵进行第二层解放,即更深刻地认识先锋文学到底是什么?除了形式和技术层面的意义之外,先锋文学是否还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别的资源?在他看来,先锋派有其商业性或目的性,不少先锋作家在写先锋小说时,有着非常明确的“读者预期”、“期刊预期”和“批评家预期”。“我们有时难免理想化地认为先锋文学代表着纯文学,代表着一种艺术本体论的态度。但把它放回文学史现场就会发现,它并没有那么单纯。”

也是在这一层面上,丛治辰提到先锋文学更深远的影响,或许是促成了一个共享着同样审美趣味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形成,而他们共享的审美趣味,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一种宰制性的审美趣味。

由此,他认为我们或许可以脱离当代文学史的具体语境去认识“先锋”的意义。先锋是一种姿态,它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样貌,它应该永远像是文学的先头部队一样走在前面。它的产生恰恰是因为现实发生了变化,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现代经验中空前复杂的现实,这样的现实是传统现实主义难以处理的。“而今社会现实不断变化,文学也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才能先锋,也才能更好地回应现实。‘先锋’和‘现实主义’还将持续地互动下去。”

实际上,作家们只有在写作中,让“先锋”和“现实主义”深度互动和融合,才能对当今纷纭复杂的现实有深刻的书写。评论家贾梦玮表示,文学不是对现实的镜子般的反映,优秀作家和作品总是试图创造另一个世界,使之成为现实的参照物,让读者得以透过作品反观现实和自身。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非常独特而多面的。“现实有时是作家‘伴侣’和‘参照’,更多时候还可能是作家的‘对手’,因为作家对现实人生采取的是一种审视、反思的态度。”

确实如此,现实的巨变常常让作家们措手不及。以评论家刘大先的观察,当下城市与乡村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。“有些城市是类似城乡接合部的存在,它不能被理解为乡村的升级版,也不能看作是城市的未成熟状态,它是一个独立的不断变化的状态。”与此相仿,在他看来,如今的乡村也早已不是敲打“城市文明病”的那根棍子,也不再代表着一种遥远的乡愁式的想象。“换言之,我们无法设想

任何一种本质化的乡村或者城市,如果要寻找所谓当代中国故事,就必须从当下中国的真实出发——这种真实可能无比粗糙,但它充满着左奔右突的活力和各种各样的潜能。”也因此,作家们与其泾渭分明地去刻意划分不同地域的经验,不如接受生活中的混沌、暧昧与不清晰。

与这般暧昧不清的现实相对应,如今很多作家写的小说面目也是暧昧不清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逃避写作难度的一个理由。评论家申霞艳表示,对于经历过先锋洗礼的作家来说,寻找某个句式和概念也许并不难,真正写出具有探索难度和丰富意蕴的作品却不容易。信息富集的时代一方面使得故事频频涌现,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,一方面也对作家呈现现实的能力提出挑战。倘是作家处理现实的方式直接来自新闻,写小说降格为写故事,肯定不会令人满意。在这个意义上,申霞艳认为,今天的作家,应该重新向路遥、向非虚构写作学习。“为了写好省委书记,路遥曾拜托书记家的保姆带他偷偷观察书记家的角角落落。这种深入实地的处理方式,对今天的作家依然有借鉴意义。与此同时,这几年非虚构写作之所以引起关注,也可能跟我们不大相信一个人坐在书斋里,能生出何种想象力有关。就此而言,现实主义主要还是一种精神,考验的是,面对生活、面对社会现实,我们是否具有一种谦卑诚实的态度。”

话虽如此,如评论家颜炼军所说,先锋文学对语言本体的重视依然值得重视。作家面临的永恒难题正是先锋的要义,亦即通过改善语言和形式来呼应和锻造生活经验的“变”与“常”。“有效的写作始终是先锋的,不仅探索新经验带来的刺激,最后也归结为语言形式的变革与更新,由此形成经典文本。”



作家路遥(左一)在鸭口煤矿体验生活时,与矿工们一起下井

第三届扬子江诗会·大家讲坛设计了“主要凭借个体发展的新世纪诗歌带来了何种新变?”“新世纪诗歌的成就及其经典化的可能性”两个议题,议题潜在的背景即是,新世纪诗歌二十年是否留下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。

诗评家张清华前两年曾编过一部中国新诗百年编年,他按照诗歌发表年份编下来,编了十卷,大致是十年为一卷,他发现其中有些卷经典性比较高,有些卷的经典性就比较差。当编到上世纪九十年代,他发现那时的诗歌给他目不暇给之感,觉得哪怕是删掉一首都可惜,所以这一卷也编得特别厚,但到新世纪以后,他就开始犹豫了,他如果选那些粗糙的,出版社也不会容忍,但选那种四平八稳,抒情性很强的,他又特别不甘心。总而言之,在他看来,两相对比,九十年代留下来的经典文本,是相对比较多的。而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虽然也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文本,但要说完成性高的,无可挑剔的文本则比较少。

这并不是说新世纪以来可供挑选的诗歌数量少。诗评家霍俊明援引相关数据表示,当今中国诗歌的数量实际上极为可观。“全唐诗也就五万多首,但今天每一天诗歌的产量,包括数字平台上发出来的,就已经超过了全唐诗。”霍俊明进一步表示,如今在有关诗歌网站上注册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万,我们所能看到的民间交流的诗歌刊物,包括以书代刊的诗歌刊物,也有1100多种。这样一个发展盛况本身,也是新世纪诗歌二十年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。

当然,新世纪诗歌更是在形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这主要体现在2000年以前,中国诗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流派、社团,或者说诗人们通过群体发声。新世纪以来,诗人们变成了一个单数的个体。他们的写作,就像评论家何平所说,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化写作或者说个体诗学。(下转第3版)

诗歌：充分表达个体经验的同时，怎样连通民族、历史、时代的经验？